

◆政學私言

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錢穆 著

40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◆ 政學私言

◆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

民族性及中國文化

聯經



A89015

錢賓四先生全集④

政學私言

錢 穆 著



錢賓四先生全集 ④

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

錢 穆 著



出版說明

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末期，日寇囂張，時局阨陞，後方人心惶擾不安，時錢賓四先生正值久病初癒，靜養期間，握筆遣悶，遂撰論時政文共七篇，胥爲針對戰後國家未來應走之途徑而作者，並曾先後刊布於東方雜誌。旋以商務印書館擬印單行本，先生遂以此七篇編爲上卷；又將其前所撰發表於思想與時代月刊之八文編爲下卷，以其與上卷性質相類，可相互證發也。本書主旨在從中國固有歷史文化傳統立場，爲建立未來新中國之理想作設計藍圖，其範圍包括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法律、教育等各方面。惟先生自以時政爲生平所疏，而所言又有違崇重西化之時尙，故特將本書定名爲「政學私言」。

本書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抗戰勝利初期，出版於重慶。八年抗戰雖勝利結束，而不幸我國政局社會則並未因之而得漸進安定。國家內部動亂繼起，新中國之建立遂成泡影。此下經歷近五

十年長時期之動盪分裂，今國家之統一已漸有望，未來新中國之建立與復興，本書所言必將有其貢獻。

本書於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復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北再版，收入該館人文庫。其後先生嘗重讀此書，就原書有所增修改訂。惟以是書未再重排，因亦未能據之改版。今整編全集，即以經先生修訂者爲底本；又增收先生同時期所寫變更省區制度私議、中國之前途、建國信望三文，是皆與原書各篇宗旨相符而可相參證者。凡新添各篇，目次中例加注「*」號。又全書通加私名號、書名號、引號，並增添分節分段之版式處理，以利讀者閱讀。排校之工作雖力求慎重，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，敬希讀者不吝匡正。

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自序

客歲，胃痛時劇，經春歷冬，每發愈厲。醫囑入院檢驗，謝事靜攝。值寇氛囂張，獨山淪陷。後方惶擾，訛言日興。牀褥無聊，惟對報紙；或有朋徒相訪，言思所涉，鬱結百端。開歲小痊，頗能興起，時尚僅飲湯液，一日七餐，每歷兩時，即復進食。一餐之前後，例作小憩。其間偶得數十分鐘閒，握筆排悶，隔越旬日，亦成篇幅。春盡花落，病乃向已。檢點成稿，凡獲七章。其所論刊，皆涉時政，此爲平生所疎，又不隸黨籍，闇於實事。洛陽少年，見譏絳灌，老不知休，更可慙恥。抑時論所尚，必有典據，或尊英美，或師馬列，螺贏之祝，惟曰肖我。其有回就國情，則以黨義爲限斷，區區所論，三俱無當，謚曰「私言」，亦識其實。風林之下，難覓靜枝，急湍所瀉，無遇止水，率本所學，吐其胸臆，邦有君子，當不憫笑。蒙東方雜誌社代爲刊載，又承王君雲五允作單本印行，用廣流傳，私衷感激，未可名狀。別有爲思想與時代撰文數

篇，此乃三年前舊作，附諸下卷，取相證發，要之爲一家之私言云爾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六月錢穆識。

出版說明

民國六十七年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立一學術講座，定名「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」，每年邀請中外傑出學人一位蒞港講學，以廣切磋啟導之益。先生為新亞書院創辦人兼首任校長，講座既以先生之名為紀念，第一次講座因即敦請先生任之。是年十月，先生遂自臺北赴港，以三週時間作連續六次之公開講演，集講稿成此一書。時先生已高齡八十六矣，蓋亦難得之盛事也。

此書仍繼續早年中國文化史導論之精神，主旨在通過中國歷史，經由中西比較，求對中國之民族性有更明白之認識，並能對中國民族所展演之文化有更深切之體認與珍重。書名定為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」，先生自謂「此實余近三十年嚮學一總題」。六講之中，二至四講，分別講中國人之性格、行爲、思想，易言之，即從人生之三方面切入以論中國人。第五講則講中國人之文化結構，指明中國文化之特殊趨向。末講則深望於中國之新「士」，能在歷史

舊傳統上加入時代新精神，以開創國家民族之新機。情深意厚，信可使聽者、讀者皆有以振起。是書民國六十八年八月由香港中文大學邀請出版，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刊行。今值整理先生著作編爲全集，爰依例增入書名號、私名號及重點引號，以利閱讀。整理有未盡善之處，敬希讀者指正。

本書之整理，由洪素年小姐負責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序一

民國六十六年之夏，金耀基院長自香港來臺，訪余於士林外雙溪素書樓寓廬。是爲余兩人初次之相識。耀基告余，擬爲新亞創辦一「學術文化講座」，即以余名名之。邀余作首次講座之講演。謂此講座，當每年舉辦一次，廣邀中外學人，集多方意見；庶可資號召，提興趣，漸成風氣，鼓舞研討。或亦有當於當年新亞建校之宗旨。儼余贊同，彼返港後擬即設法籌募款項，作爲基金。俟有成績，再以相告。此事創始雖微，積久或可得巨效。耀基言辭懇切，余漫允之。不數月，耀基來信，籌款已有頭緒，決於翌年秋正式舉辦。乃余於六十七年初春，忽嬰眼疾，逐時加深，不能見字，即報紙上大標題亦模糊不能辨。然念耀基誠摯之意，初亦謂尙有十月之隔，或可臨時小愈。耀基亦堅請，告余：臨時如不能親自出席，亦當由余任首講，邀人代讀一論文即可。余終亦無以拒之。卒於是年十月赴港，以一月之期，分作六次講演。僅就余平日積存胸中之素

念，稍分層次，略抒梗概。事後乃根據當場錄音，粗加整理，再交耀基由校方付印，即今出版之此稿是也。余每念：初辦新亞時，赤手空拳，曾無絲毫之憑藉；乃蒙校內外各方共襄艱難，使新亞獲有今日之成就。今耀基創始此一偉大之構想，而余竟亦以盲眼空腹，謬膺其最先之第一講，正與余往年之始創新亞同其輕率。幸耀基不怠不倦，此稿問世，耀基已續聘英國李約瑟教授來為此講座之第二講。此下逐年規劃，按期有人來賡續此講座，焉知不蔚成巨觀，乃與新亞同躋於日新又新，而有其無量之前途。耀基又來書，囑余於此稿付印前加爲一序。余除自陳其內心之慚疚外，特於耀基對此事之擘劃經營，深思密慮，有其無窮之盼望焉。爰又不辭而序之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二日錢穆序，時年八十有五。寫此稿時，寫第二字即不識上面第一字。不文之處，幸讀者諒之。

序二

中國人及中國，歷史悠久，文化深厚，至今舉世莫與倫比。司馬遷史記始五帝本紀之黃帝，約略推計，已逾四千六百年。若據周易繫辭傳，黃帝前有神農、庖犧，當亦五六百年。更不計莊子所言燧人氏、有巢氏等。中國人在此亞洲東部一塊土地上，自狹小漸躋廣大，自寡少漸臻眾多，縣延五六千年；可稱創建了一代代表性的民族國家，一線相承。其間縱有不斷變化，要之，能自成一天下，自有一傳統，屹立常在，堪謂舉世人類一奇蹟。

除東亞外，尚有西歐，異軍特起。論其歷史文化，乃與東亞中國差堪匹敵。乃雙方接觸少，各自發展，不相關涉。直到最近五百年來，西歐勢力逐步震撼了全世界，而東亞亦受其影響。

中國人及中國，雖自古獨立成長，在其自占有之天下中，自生自育。然其人富敏感性，虛衷好學。凡所遭遇，莫不以其誠摯之同情心，和平之同化力，力求變異爲同，化敵爲友。史證明

顯，不煩縷述。遠自明末利瑪竇東來，中國學人與其交往，如徐光啟等，即亦深受浸染。惟清明、清易代，此風不繼。直到清乾隆末，其時中國社會正值盛極而衰，久安思變。而西歐勢力則日益強大，威鋒迫人。魏源默深著海國圖志，及代賀長齡纂經世文編，一面注意國外形勢，一面注意國內政治變革；正可透露出清代嘉、道以下知識分子學術思想轉入新途，以求因應之一新趨嚮。

而不久洪秀全、楊秀清崛起，憑藉耶教，煽動愚民。洪秀全自稱「天弟」，奉耶穌爲「天兄」，創建太平天國；所至焚燬孔廟，盛唱女權，興辦新科舉，政治、文化兼求革命。後人雖稱之爲開此下民族革命之先河，其實洪、楊以專崇西化、打倒中國傳統爲其起腳點，於是激起了曾國藩、胡林翼、江忠源、羅澤南一輩舊式知識分子之義憤，起而反抗。湘軍之眞精神、眞動機，實爲保衛民族文化，抵禦西化侵入。而滿清政權，遂亦得苟延其殘喘。

眞正之民族革命則端自辛亥始。孫中山先生之「三民主義」，首曰「民族主義」，遠溯文化傳統，直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以來。此與洪秀全之天兄、天弟之號召，既絕相違異；亦與一輩專以中山先生比擬之於美國華盛頓者，仍有徑庭。華盛頓美國革命乃「爭民主自由」，而孫中山先生之辛亥革命乃「尊民族傳統」。故在革命前，以排除滿清爲目標；革命

後，則以「五族共和」爲幟志。此非甚深體會於吾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大傳統之精義所在者，莫能知。而中山先生「知難行易」之一套哲學，尤當爲國人所深細體悟。否則亦將不能上承中山先生之遺志。

中華民國創建以來已近七十年，而國步杌隉，遑離初志益遠。幾於今不如昔，人有同感。一方面固是牽於外患，而另一方面實多發自內亂。不僅對外維艱，實亦對內無方。竊謂今日我中國人自救之道，實應新、舊知識兼採並用，相輔相成，始得有濟。一面在順應世界新潮流，廣收新世界知識以資對付；一面亦當於自己歷史文化傳統使中國之成其爲中國之根本基礎，及其特有個性，反身求之，有一番自我之認識。然後能因病求藥，對症下方。印度人當求印度人之如何自救，阿剌伯人當求阿剌伯人之如何自救，即在西歐、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比、荷、西、葡，乃及其他諸邦，若求各有改進，亦各有其自我傳統，即各有其對治良方。甚至如美國移民四百年，立國二百年，自有其天地，自有其環境，已遠與其祖國英倫相異；然而其文化傳統，立國精神，亦尙不能不認其淵源之自來。若果自我迷失，豈有不得其體乃能見其病，而有海外異方可資救治之理？

民初以來之「新文化運動」，誤認爲我自己固有舊傳統與海外新潮流一若水火之不相容，冰炭之不共存；非破除一分舊，即開不出一分新。一面高倡「打倒孔家店」，一面又叫「全盤西

化」。提倡西化，爲求自救。果使西化與自我敵體對立，則用藥即以自殺，復何良醫足云？

自新文化運動中轉出共產運動，至其尊奉馬、恩、列、史，則與洪、楊之尊天父、天兄何異？惟宗教尙屬世界性，尊奉馬、列則顯屬西化。至其得操政權以來，亦已三十年；摧殘破壞可謂已不遺餘力。而中國人之舊傳統、舊習慣、舊性情、舊風俗，依然尙存；當感破除之不易。及今則國將不國，人將無生，尙何「共產」之可期？

余幼孤失學，弱冠即依鄉鎮小學教讀爲生。然於當時新文化運動，一字、一句、一言、一辭，亦曾悉心以求。乃反而尋之古籍，始知主張新文化運動者，實於自己舊文化認識不真。如當時競謂中國乃一「封建社會」，然秦以下中國既非封建，即夏、商、周三代史籍可考者，亦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迥不相侔。又當時競謂中國自秦以下乃一「君主專制政體」，然遍考之二十五史、三通諸書，中國自秦以下，最少亦當稱其爲是「君主立憲」，決非「君主專制」，否則一切典章制度均將無可解釋。又當時人競慕西方史上之「文藝復興」，實則西方之所謂文藝復興，亦僅以歷史回顧來代替了其宗教嚮往。今日國人方競以好古守舊自詡。中國文化中亦並無一普遍歷久之共同宗教，而今日之崇尚西化，則已儼成一宗教。所謂期求文藝復興，亦只期求西化而止，復何所謂「復興」？迷失了自己，而求復興，則中國古籍一番舊知識顯不可棄。此特舉其